

# 西方近代以來漢語研究的成就

張西平\*

本文分別從漢外辭典的編纂、漢語語法的研究、中文拼音的形成、中國近代辭彙的變化四個方面系統梳理了西方近代以來漢語研究的成就，從語言學史的角度揭示了近代以來中西文化的互動和交流。

大航海以後西方經歷了近四百年的學習漢語的運動，從1500-1910，在這四百年中西方為我們留下了一筆豐富的學術遺產。這筆遺產不僅對於研究西方漢學史具有重要意義，而且對於漢語本體的研究，對於比較文化、比較語言學的研究，對於今天對外漢語教學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對於這筆學術遺產至今中國和西方的語言學界都還未引起足夠的重視，更談不上系統的研究。<sup>(1)</sup>以下筆者祇能概略地對這一學術遺產作一個簡單的評價，以便以後學界對其進一步展開深入的研究。筆者認為西方這一時期漢語學習和研究運動的成就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 開創了漢外辭典的編纂工作

根據目前的瞭解，“第一部中外合璧的字典，是1575年到達福建沿海的西班牙奧斯定會士拉達（M.de Rada）根據家州土音（閩南話）用西班牙文編著的《華語韻編》。”<sup>(2)</sup>明末耶穌會入華以後最早編纂的雙語辭典是由羅明堅和利瑪竇所編纂的《葡漢辭典》。該辭典大約形成於1584-1588年之間，但直到1935年才被意大利漢學家德禮賢（Pasquale D'Elia, S.J., 1890-1963）在耶穌會檔案

館發現，近幾年來才開始有人對它作較為深入的研究。<sup>(3)</sup>該辭典“葡語詞彙約收6,000餘條，而與之對應的漢語字詞祇有5,460多條，有540多條葡語詞彙尚未填漢語對應詞。”<sup>(4)</sup>該辭典在西方人的漢語與西方語言的雙語辭典編纂史上有以下幾點不可取代的學術地位：

其一，它是最早的漢語 - 西方語言對照辭典之一。正如楊福綿所說，雖然此時中國已有《華夷譯語》，但主要是漢語與少數民族及鄰國語言的對照辭典，真正的漢語與歐洲語言對照的雙語辭典應是從《葡漢辭典》開始的。

其二，它是最早的用羅馬字母給漢字注音的系統，實際上是最早的中文拼音方案，這點筆者下面還要專講。

其三，它為研究晚明語言學提供了第一手的材料。楊福綿先生認為根據這個辭典可以判定明朝時的中國官話是以南京話為基礎的。<sup>(5)</sup>

《葡漢辭典》作為入華傳教士所編的第一部葡漢辭典還較為粗糙，“因為它屬於初創，在聲母和韻母拼寫法上，尚未完全定型，甚至有些模糊混淆的地方。”<sup>(6)</sup>但明清之際的入華傳教士，尤其是耶穌會士，沿着羅明堅、利瑪竇所確立的方向不斷努

\* 張西平，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北京外國語大學海外漢學研究中心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基督教研究中心副主任。

力，編纂出了一大批雙語辭典，甚至多語對照辭典，其數量之大、成就之高都是令人吃驚的。王力達先生認為1575-1800年間，傳教士曾編過六十多種漢語或漢外對照類辭書，大部分為抄本，約有五十多種保留至今。<sup>(7)</sup>

這裡有兩點應當注意，一是耶穌會不僅編寫雙語對照辭典，而且還編了多語對照辭典，如孫璋（Alexandre de La Charme, 1695-1767）就編有一部《漢蒙法語字典》，錢德明（Jean-Joseph-Marie Amiot, 1718-1793）所編的《滿法字典》、《滿、藏、蒙、漢、梵字典》，魏繼晉（Florian Bahr, 1706-1771）編了《六種語言大字典》，將漢語與拉丁、法、意、荷、德等語言相對照。

另一點就是在歐洲本土各類漢外雙語辭典也不斷被編纂出版，德國早期漢學家門采爾（Christian Mentzel, 1622-1701）所寫的《中文、中文寫作和中國官話發音的鑰匙》（Clavis Sinica, ad Chinensium Scripturam et Pronunciationem）是一部識字與發音的辭典。而米勒（Müller）則編出了《中文鑰匙》（Clavis Sinica）一書，這部辭典曾對萊布尼茨影響很大。德國派到俄國工作的巴耶（T.S Bayer, 1694-1738）寫了《Museum Sinicum》（1730），書中介紹了中文的書寫和字形，這部書無論在俄國漢學史上還是在德國漢學史上都有重要意義。<sup>(8)</sup> 18世紀規模宏大的《漢-法-拉丁詞典》在拿破侖的支援下於

1813年由法國皇家印書局出版，“這是一項名副其實的巨大工程，碩大的漢文方塊字14,300個左右，字體為40點，大於1釐米。其中大部分的漢字是木刻版，由法國工匠從近一個世紀之前的傅爾蒙時代開始製作。”<sup>(9)</sup>

進入19世紀以後，隨着基督新教傳教士的入華，新一輪的雙語編纂熱潮興起，出現了馬禮遜的《華英詞典》（1822）、《廣東省土話字彙》（1828）、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的《廣州土話注音》（1841）、吉士的《上海土白話入門》（1855）、高第丕（Tarleton P. Crawford）的《上海土音字寫法》<sup>(10)</sup>、慕維廉（William Muirhead）的《英漢字典》（1848）、合信（Benjamin Hobson）的《英漢醫學辭彙》（1858）、鮑康寧（Frederic William Baller）的《漢英分析字典》、禧在明的（Walter Caine Hillier）的《袖珍英漢字典》（1910）等一批新書。<sup>(11)</sup> 據吳義雄統計，“在1849年之前，西方各國學者編著的這類書籍有四十種，其中為新教傳教士編著的有十七種。除上述馬禮遜的著作外，麥都思、裨治文、衛三畏、戴耶爾、高德、地凡、舜為仁等新教傳教士編寫的中西文辭典和中文辭彙、對話方面的書，尚有十二種，此外還有曾在英華書院學習、後任林則徐英文譯員的袁德輝著作一種。”<sup>(12)</sup> 其它早期新教傳教士編著的中文詞典如下：<sup>(13)</sup>

1807年以後新教傳教士所編著之各種中文辭典

| 書 名                                                                           | 作 者    | 出版時間 | 出版地點 |
|-------------------------------------------------------------------------------|--------|------|------|
| <i>Dictionary of the Hokkeen Dialect of the Chinese Language</i><br>福建省土話辭典   | 麥都思    | 1837 | 澳門   |
| <i>Vocabulary of the Hikkeen Dialect</i><br>福建省土話字彙                           | 戴耶爾    | 1838 | 新加坡  |
| <i>A Chinese Chrestomathy in the Canton Dialect</i><br>廣東方言中文文選               | 裨治文    | 1841 | 澳門   |
| <i>A Lexilogus of the English, Malay and Chinese Languages</i><br>英文-馬來文-中文辭典 | 英華書院教材 | 1841 | 馬六甲  |
| <i>First Lessons in the Tiechiw Dialect</i><br>潮州土話初階                         | 廊為仁    | 1841 | 曼谷   |
| <i>Easy Lessons in Chinese, adapted to the Canton Dialect</i><br>拾級大成         | 衛三畏    | 1842 | 澳門   |

|                                                                                                     |     |      |      |
|-----------------------------------------------------------------------------------------------------|-----|------|------|
| <i>Chinese and English Dictionary, 2 vol</i><br>漢英辭典兩卷                                              | 麥都思 | 1843 | 巴達維亞 |
| <i>An English and Chinese Vocabulary in the Court Dialect</i><br>英華韻府歷階                             | 衛三畏 | 1844 | 澳門   |
| <i>Chinese Dialogues, Questions and Familiar Sentences</i><br>漢英對話、問答與例句                            | 麥都思 | 1844 | 上海   |
| <i>A Chinese and English Vocabulary in the Tiechiu Dialect</i><br>漢英潮州土話字彙                          | 高德  | 1847 | 曼谷   |
| <i>The Beginner's First Book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Canton Vernacular)</i><br>中文入門（廣州土白）          | 地凡  | 1847 | 香港   |
| <i>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2 vols</i><br>英漢詞典                                               | 麥都思 | 1848 | 上海   |
| <i>English and Chinese Student's Assistant, or Colloquial Phrases, letters &amp; c.</i><br>英華學生口語手冊 | 袁德輝 | 1826 | 馬六甲  |

如果說《葡漢辭典》反映了早期天主教傳教士入華時在語言上的一種努力，那麼馬禮遜的《華英詞典》（*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則代表着1840年以後新教傳教士在雙語詞典編著上的努力與成就。《華英詞典》共分三部，第一部名為《字典》，由三卷組成。共有2700多頁，主要依據《康熙字典》編譯而成，馬禮遜在序言中說：“《字典》的第一部分的排列和字數就是根據《康熙字典》，字的釋義和例子也主要取自《康熙字典》、取自本人應用漢字的常識、取自羅馬天主教徒字典的手稿。摘自中國學者和有目的閱讀的各種著作。”<sup>（14）</sup>第二部名為《五車韻府》，共2,573頁。第一卷主要根據中文的發音，按英文字母排列漢字，使人瞭解每個字的聲調、發音，同時還附有羅馬天主教士未刊的《字母字典》和廣東方言發音，來幫助人們查字。<sup>（15）</sup>第二卷則按偏旁和字根來排列漢字。《華英字典》的第三部是《英漢字典》，共480頁。

《華英字典》前後歷時八年。為刊印此書，東印度公司先後支付了12,000元。《華英字典》是近代以來西方人在學習漢語過程中編纂辭典的一個典型代表，其學術貢獻十分明顯：第一，這是第一部漢英辭典，對西方人學習漢語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法國漢學家雷慕沙說：“馬禮遜博士的《華英字

典》與其他字典相比，具有無可比擬的優點。”<sup>（16）</sup>第二，這是第一部英漢辭典，對於中國人學習英文來說不可多得。吳義雄在談到這本書時說：“它本身是當時一部比較權威的中西文辭典，同時也開啟了19世紀包括其他傳教士在內的西方學者編纂類似辭書的風氣，從而為近代的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不可缺少的語言工具。”<sup>（17）</sup>

### 開拓了中國語法的研究

西人入華以後第一部關於中國語法的研究著作是多明我會傳教士弗朗西斯科·瓦羅（Francisco Varo）用西班牙文所編的《官話藝術》（*Arte de la lengua mandarina*）。這本書1703年在廣州以木刻出版<sup>（18）</sup>，實際上作者想把漢語納入印歐語法系統之中，他編寫此書時所依據的就是1481年由艾里約·安多尼奧·內不列加（Elio Antonio Nebrija, 1441-1552）所編寫的《文法入門》（*Introductiones Latinae*）。

這本書的第三至第十三章討論了中文語法問題。<sup>（19）</sup>第三章闡述性數格的變化及複數形式；第四章介紹體詞（形容詞在體詞內）及比較級和最高級；第五章分析動詞、指示詞、反覆動詞、職業代詞及詞的性別；第六章再次談到代詞（人稱代詞、

指示代詞、關係代詞、相互代詞)；第七章分以下欄目：感歎詞、連詞、否定詞、反問詞、條件式詞；第八章敘述動詞及動詞變位；第九章主要講被動句式；第十章談介詞及副詞，是該書內容最豐富的一章。它對列出的大量副詞進行了理解與翻譯，並以西班牙文字母順序進行排列；第十一章祇有幾頁，主要解釋句子的組成；第十二章討論數詞。最後的第十三章主題為助詞。<sup>(20)</sup>

瓦羅的書首開漢語語法研究之先河，功不可沒，但書中真正探討語法的部分不足三十頁。另外，他對中國文獻、語法資料的瞭解十分有限（全書沒有一個漢字），因而實際影響不大。

而按時間推算此時被梁宏仁帶到巴黎的中國教友黃嘉略在1716年所完成的《漢語語法》應是一本重要的書。此書雖然並未出版，但在法國漢學史上是有意義的。全書分兩部分，第一部分講漢語語法，語音、生活用語、書面用語，後半部分介紹中國的一般情況。<sup>(21)</sup>真正開拓了中國語法研究的是法國入華傳教士馬若瑟。他的《中國語言誌略》(Notices sur la langue chinoise)，這本書1728年寫於廣州，但直到1831年才在馬六甲出版，1847年才被布里奇曼(Bridgman)由拉丁文譯為英文出版。

《中國語言誌略》共分四個部分：緒論介紹了中國的典籍、漢字書寫及漢字發音的特點，並按照中文發音尾音的序列列出了1,445個常用字簡表。<sup>(22)</sup>第一部分以口語語法為主，介紹了中文口語的基本特點和語法特徵。<sup>(23)</sup>第二部分介紹了中文的書面語言，說明了古漢語的語法和句法，古漢語之虛詞及書面語的修辭方法和例句。<sup>(24)</sup>

馬若瑟的《中國語言誌略》在西方漢語學習史、研究史上有着不可取代的地位，這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sup>(25)</sup>：

第一，它是西方第一部系統的漢語語法著作。瓦羅雖首開漢語語法研究之先河，但他基本上仍是以拉丁文語法來套漢語語法，而且僅有三十頁的內容，祇能稱得上是一個大綱。而馬若瑟的書僅從中國各類文獻中引用的例句就有一萬三千餘條，雖然仍有印歐語法體系等之痕跡，但他“力求越出歐洲

傳統語法的範疇”<sup>(26)</sup>，努力從漢語文獻本身概括出自身的語法規律。無論從其規模、體系、還是文獻的豐富性來看，把其稱為“西方人研究我國文字之鼻祖”是當之無愧的。法國漢學家戴密微(Paul Demieville, 1894-1979)把這本書稱為“19世紀前歐洲最完美的漢語語法書”<sup>(27)</sup>是十分恰當的。

第二，它是首次把漢語分成白話和文言兩部分來研究的著作。漢語的書面語言和口頭語言歷來有很大區別，許多入華傳教士在學習漢語時都體會到了這一點。馬若瑟敏銳地意識到這個問題的重要性，在《中國語言誌略》中把白話與文言語法的區分作為全書的基本構架，白話部分的材料大多取自元雜劇、《水滸傳》、《好逑傳》、《玉嬌梨》等小說；而文言部分的語言材料則主要取自先秦典籍、理學名著等。

把馬若瑟的這一嘗試放到中國語言學史中就可顯示其學術價值。中國近代漢語的發展過程就是一個解決書面語與口語嚴重脫節而不斷用現代書面漢語取代文言的歷史過程。明清時的白話文運動，由黃遵憲、裘廷梁、陳榮袞開啟了對文言文的批評，而“5.4”時的白話文運動則將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與反封建聯為一體，在陳獨秀、胡適、錢玄同、魯迅、劉半農等人的努力下，終於使白話成為現代漢語的主體。<sup>(28)</sup>1920年“學校語文課程也發生了突變，首先把小學兒童三千條一貫誦讀的文言文改為白話文，因而把課目名稱‘國文’改為‘國語’；……這就意味着：一、是現代的漢語，不是古文（文言文）；二、是大眾的普通話，不是某一階層的‘行話’和某一地區的‘方言’。”<sup>(29)</sup>這說明白話進入學校到1920年才成為現實，而被稱為“第一次系統地研究了白話文語法，形成了一個完整的語法體系，使語法知識得以普及……”<sup>(30)</sup>因而，馬若瑟這本書實際上開啟了中文白話語法研究之先河。

第三，它是近代以來漢語語法的奠基石。

近代以來的漢語研究在三個地域展開，一是在歐洲本土，二是在港澳、南洋一帶，三是在中國本土。馬若瑟的《中國語言誌略》對這三個地域的中

文語法研究都產生了影響。

雷慕沙是“第一位在歐洲僅從書本瞭解中國而成功地掌握了有關中國深廣知識的學者”<sup>(31)</sup>。在歐洲本土最早出版的漢語語法書是前面講過的從德國到彼得堡的漢學家巴耶爾（Theophilus Siegfried Bayer）的《中華博物館：詳論漢語和中國文學的道理》（*Museum Sinicum in quo Sinicae Linguae et litteraturae ratio explicatur...*）。這本書不僅介紹了中國的文字，也是歐洲最早介紹中文語法的書籍。<sup>(32)</sup>當時法國的一名學者傅爾蒙（Etienne Fourmont, 1683-1745）在1742年也出版了一本中文語法書，《中華官話和文字的雙重語法》（*Linguae Sinarum Mandarinicae Hieroglyphicae Grammatica duplex*），但當代學者認為該書抄襲了馬若瑟書的很多內容，其水平遠趕不上馬若瑟。<sup>(33)</sup>在歐洲漢學界影響最大的漢語語法書是由法國第一位漢學教授雷慕沙寫成的，而雷慕沙在法蘭西學院開設漢語課程所參考的書主要就是馬若瑟的書，一百多年來這部手稿藏在圖書館無人問津，經雷慕沙的學習、介紹，它才漸為人知。雷慕沙1822年出版的第一部語法書《漢語語法基礎知識》（*Eléments de la grammaire chinoise*）就“受到了此書的啟發”<sup>(34)</sup>。這部書被認為是歐洲“第一部科學的從普通語言學的角度論述漢語語法的學術性著作。”<sup>(35)</sup>從此以後，“雷慕沙在法國公學開創了公開研究漢語，包括民間漢語和古典漢語的先河。從此，有關漢語語法的著述便不斷增多了”<sup>(36)</sup>。

在亞洲的新教傳教士馬禮遜於1811年寫了《通用漢言之法》，但實際到1815年才正式出版。他按照英語語法特點對漢語進行了研究，“他將英文的基本語言規律也當作中文的語言規律，而將中文納入他非常熟悉的母語的語法結構中。……作為第一部系統論述中國語法的著作，該書在漢語語法研究史上具有開拓性意義。”<sup>(37)</sup>馬禮遜在寫這部書時未看到馬若瑟的書，但他對這本書十分關心。一位叫金斯伯羅子爵（Viscount Kingsborough）的人出資1500英鎊，在馬禮遜的具體安排下1831年由馬六甲

英華書院出版了此書的拉丁文第一版，1847年又是裨治文的堂弟詹姆斯·裨治文將其翻譯為英文，在《中國叢報》上出版。<sup>(38)</sup>這說明在南洋一帶活動的新教傳教士對馬若瑟這本書一直十分重視。

在中國，1898年由馬建忠所出版的《馬氏文通》是在中國本土由中國學者所寫的第一部中國語法書，王力先生把這一年作為中國現代語言學的開始之年。《馬氏文通》對中國語法學的建立功不可沒<sup>(39)</sup>，但有些國外學者認為馬若瑟的著作“確實對《文通》起了影響。這部著作，實際上也許可以說是馬建忠在上海森伊涅斯（Saint Ignace）教會學校讀書期間，最早接觸的語法著作之一。……實際上，我們知道當時該教會學校的耶穌會神父就是用這部著作作為語法參考書的。同時，不難看出這兩部著作有着共同點，特別在組織結構方面。”<sup>(40)</sup>這個問題還有待進一步從史料和內容本身去加以論證，但貝沃海力（Peverelli）認為這個意見有一定的合理性，說明了馬若瑟的書和《馬氏文通》之間的某種聯繫。<sup>(41)</sup>姚小平在談到這個問題時有一段很好的說明：“在世界漢語研究史上，《文通》並非第一部完整的、構成體系的漢語語法書，也並非第一次系統地揭示出古漢語語法的特點。《文通》的歷史功績在於，它創立了中國人自己的語法學，打破了文字、音韻、訓詁的三分天下，使中國傳統語言文字學向現代語言學邁出了堅實的一步。……《文通》永遠值得我們紀念，但對《文通》以前的歷史，我們也應尊重，在那段歷史未澄清之前，我們對《文通》的功過得失便不可能有全面認識。”<sup>(42)</sup>

19世紀西方人出版的中文語法書還有<sup>(43)</sup>：

馬士曼（Marshman）在1814年（嘉慶十九年）英國的 Serampore 出版了《漢語語法要素：漢語的鑰匙》（*Elements of Chinese Grammar, Clavis Sinica*）。1815年馬禮遜也在 Serampore 出版了他的《漢語語法》（*A Grammar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1829年（道光九年），在澳門出版 J.A. Gonçalves 的《漢語文字語法入門》（*Arte China*

*constante de alphabeto e grammatica*)。

1834年(道光十四年),在俄國的聖彼得堡出版Yakinf的《漢語語法》(*Kitajskaya grammatika*)。

1853年(咸豐三年),在上海出版的《上海方言土話語法》(*A Grammar of Colloquial Chinese, as Exhibited in the Shanghai Dialect*)是第一部專門寫方言語法的書,一直到現在仍具有歷史語言學作用。作者艾約瑟(Joseph Edkins)是英國研究漢語語法最有成就的學者,他寫了很多關於漢語語言學的著作。<sup>(44)</sup>

法文版最早專門寫漢語官話語法的書是1856年(咸豐六年)在巴黎出版的安東尼·巴贊(A. Bazin)的《官話語法:漢語口語的基本法則》(*Grammaire Mandarine, ou principes généraux de la langue chinoise parlée*)。

英文最早的有關漢語官話語法的書是1857年(咸豐七年)在上海出版的艾約瑟的《漢語官話口語語法》(*A Grammar of the Chinese colloquial Language, commonly called the Mandarin Dialect*)。

德文這方面的著作雖然也有,但是國際影響不大:1857年(咸豐七年)在柏林出版了碩特(Wilhelm Schott)的《授課自學用漢語教程》(*Chinesische Sprachlehre, zum Gebrauche bei Vorlesungen und zur Selbstunterweisung*)。

英國殖民地的官僚們所編寫的英文教科書還有:

1863年(同治二年),在牛津出版的J. Summers的《漢語手冊、語法及文選(上、下):學習漢語的學生們所編並為其提供初級學習材料》(*A Handbook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Parts I and II: Grammar and Chrestomathy, prepared with a view to initiate the student of Chinese in the rudiments of this language, and to supply materials for his early studies*)。

1864年(同治三年),在香港出版的W. Lobscheid的《漢語語法(兩部)》(*Grammar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2 parts)*)。

1867年(同治六年),在上海出版的威妥瑪(Thomas Francis Wade, 1818-1895)的《為協助學生學習在首都使用的諺語口語而編寫的漸進課本:語言自邇集》(*A Progressive Course Designed to Assist the Student of Colloquial Chinese as Spoken in the Capital and the Metropolitan Department*)。這部書所收集的語言材料至今仍很有價值。<sup>(45)</sup>

歐洲在雷慕沙之後較有影響的漢語句法書是1869年(同治八年)在巴黎出版的儒蓮(Stanislas Julien)的《漢語的新句法》(*Syntaxe nouvelle de la langue chinoise*)。當代學者認為1873年(同治十二年)儒蓮在巴黎出版的《漢語口語及書面語的語法(第一卷:口語;第二卷:書面語)》<sup>(46)</sup>參考價值現在還很高,他的語法分析能力遠遠超過當時存在的其他語法教科書。

從馬若瑟開始到19世紀,西方人對中國語法研究的總結性著作是德國人甲伯連孜(Hans Georg von der Gabelenz, 1840-1893)的《漢文經緯》(*Chinesische Grammatik mit Ausschluss des niederen Stils und der heutigen Umgangssprache*)。全書共分三卷,共549頁。第一卷總體介紹了中文的一般性特點,漢語的歷史及漢字的書寫等;第二卷具體分析了漢語的語法特點;第三卷以原始的中文語言為材料說明中文的多種表達方法。

甲伯連孜並不是漢學家,而是著名的語言學家,因而他對中文語法的理解更為獨特。根據姚小平的研究,甲伯連孜的漢語語法觀有以下五個方面:

第一、甲伯連孜把漢語的(實)詞劃分為九類,即“歎詞、摹聲詞、指代詞、名詞、部分關係詞、數詞、形容詞、否定詞、動詞。”<sup>(47)</sup>

第二、“甲伯連孜認為,漢語句法的基礎是若干條相對固定的詞序規則。語法句子的必要成份是主語合乎謂語,分詞可以不變。”<sup>(48)</sup>

第三、虛詞。

第四、漢語的格，他認為有五種格：“1）主格：名詞在動詞前，作主語；2）表格：名詞處於句末，不受動詞支配；3）賓格：名詞處於動詞（或介詞）之後，受動詞（介詞）支配；4）屬格：一個名詞的後面跟着另一個名詞，前者為後者的限定語；5）狀格：名詞直接或間接處於形容詞或動詞之前，起着說明限定作用。”<sup>（49）</sup>

第五、心理主語。

莫東寅在《漢學發達史》中認為甲柏連孜是“以語言學者貢獻於漢學研究”<sup>（50）</sup>。當代德國漢學家 Eduard Erkes 認為：“《漢文釋緯》在漢語研究史上開闢了一個新的篇章。以往的著作，從18世紀馬若瑟的《漢語割記》到蕭特（W. Schott）、恩德利希（Endlicher）和儒蓮的語法，對漢語的語法現象已作了系統明白的解說，但對漢語的語法結構和其它特點還不甚了了。在甲柏連孜以前，人們一直無意識地受到一種成見的左右，即認為應該根據拉丁語的模式衡量每一語言、建立每一種語法體系。甲柏連孜第一個徹底擺脫了這種成見，認識到了一種印度支那語言的特性。”<sup>（51）</sup>從馬若瑟到甲柏連

孜，西方的漢語語法研究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何莫邪甚至認為甲柏連孜的這本書“是西方至今最著名的，資料最豐富的古漢語語法書”<sup>（52）</sup>。

## 開啟了中文拉丁拼音化的歷程

漢字音韻的字母之學“正式產生是在唐代。敦煌發現的唐人《歸三十字母例》和守溫韻學殘卷的三十字母都是很好的證明材料”<sup>（53）</sup>。清代音韻學有了更進一步的發展，但以拉丁字母注音漢字卻開始於明末耶穌會入華以後。

根據近十年的最新研究，第一個制定這個注音表的是羅明堅和利瑪竇。此表見於他們在肇慶時所編的《葡漢辭典》，這部辭典不僅在漢外雙語辭典編纂史上有其獨特的地位，而且正如我們在上面所講到的，它同時在漢字的拉丁字母注音史上也有着極其重要的地位。

按照楊福綿的研究，辭典的排列是一行葡語單詞，一行羅馬字，一行漢語詞，通過這種平行的對比排列使傳教士可以根據羅馬字的注音讀出中文的字或詞。例如：

| 葡語詞             | 羅馬字                | 漢語詞                 |
|-----------------|--------------------|---------------------|
| Bom parecer     | piau ci            | 嫵致，美貌，嘉（“嫵”為“標”之別字） |
| Escarnar        | co gio             | 割肉，切肉、剖肉            |
| Espantadigo     | chijn pa           | 驚怕，駭然，驚駭            |
| Esperar, cofiar | van,cau,sin        | 望，靠，信               |
| Estudar         | to sciu            | 讀書，看書，觀書            |
| Fallar          | chiã cua,sciue cua | 講話，說話               |
| Fallar Mādarin  | cuoõ cua, cinyin   | 官話、正音               |

楊福綿認為“這是羅氏在肇慶學習漢語時所創製的最早的羅馬注音，不過系統尚不完備，例如無送氣音和聲調符號；聲母和韻母的拼法尚未完全一致，不免有模稜含混的地方。”<sup>（54）</sup>幾年前筆者在中國國家圖書館工作時曾發現一份拉丁字母和漢字對照的稿本，1999年國家圖書館在《中國國家圖書館古籍珍品圖錄》<sup>（54）</sup>一書中正式公佈了這份文獻，並

注明這是利瑪竇所做，時間為1588年。這是一份極其珍貴的歷史文獻，它不僅對研究中國基督教史有着重要意義，而且對研究中文的拉丁字母注音歷史也有重要意義。因該文獻《中國國家圖書館古籍珍品圖錄》祇公佈了書影，沒有公佈全文，而且因此文獻一直未被研究者發現和注意，故現將該文獻的中文和拉丁字母注音對照表及拉丁翻譯公佈如下：



能舉一切如來，會受灌頂 *nen kiu y tsia jou lay lin cheou kouan tin*  
 能識一切有幻成清淨 *nen tchar y tsie yeou houan tchen tsin toin*  
 除舊於令趣所生之處 *tchou kieou yu lim tou Po tsu so sen tchen tichou*  
 能憶一遍 *nen y fou miñ*  
 若誦一遍 *Jo sceung y pien*  
 設壽口盡者現延壽 *chen chou tsa tsin tche hian yay cheou*  
 一切地域鐵定箴生 *y tsie ty yu tie tin mie sen*  
 獄主世界悉香成空 *yu tchen che kiay sy yao tchen koug*  
 能開一切佛國天界之門 *nen kay y tsie fou koue tien kiay tche men*  
 隨願往生 *chouy yuen ouang sen*  
 帝釋天主復白佛言 *ty che tien tchou fou pe fou yen*  
 悖贖世尊法誠總持章非時 *pey chou che tsen fa kiay tsoung tcha tchany fey che*  
 世尊受天主清說此陀囉吸 *che tsen cheou tien tchou tsin cho tse E po-i*  
 總持 *tsoung tche*  
 總持 *tsoung tche*  
 總持五百八十八春 *tsoung tche ou pe pa che lctouen* (56)

這份文獻不僅在中國基督教思想史上有着重要意義。在中國語言學史上也有着重要意義。從時間上來說，這篇文獻是繼《葡漢辭典》以後，第二篇以羅馬字母拼讀漢字的文獻，需要我們深入研究。

尹斌庸先生認為《葡漢辭典》是漢字拉丁注音的初創時期，而真正的完成時期是1598年利瑪竇第一次進京失敗後，返回南方過程中，在運河的船中與郭居靜（Lazare Cattaneo, 1560-1640）合作制定的拼音方案。《利瑪竇中國劄記》中有這樣的記載：“整整用了一個月的工夫才到達臨清城。這看來似乎是浪費了一個月的寶貴時間，但實際上卻不是。鍾鳴仁擅長使用中國語言，由於他的可貴幫助，神父們利用這個時間編製了一份中國辭彙。他們還編成另外幾套字詞表，我們的教士們學習語言時從中學到了大量漢字。在觀察中他們注意到整個中國語文都是由單音節組成，中國人用聲韻和音調來變化字義。不知道這些聲韻就產生語言混亂，幾乎不能進行交談，因為沒有聲韻，談話的人就不能瞭解別人，也不能被別人瞭解。他們採用五種記號來

區別所用的聲韻，使學者可以決定特別的聲韻而賦予它們各種意義，因為他們共有五聲。郭居靜神父對這個工作做了很大貢獻。他是一個優秀的音樂家，善於分辨各種細微的聲韻變化，能很快辨明聲調的不同。善於聆聽音樂對於學習語言是個很大的幫助。這種以音韻書寫的方法，是由我們兩個最早的耶穌會傳教士所創作的，現在仍被步他們後塵的人們所使用。如果是隨意書寫而沒有這種指導，就會產生混亂，而對閱讀的人來說，書寫就沒有意義了。”<sup>(57)</sup>但是於這個完成時期所制定的“音韻字典”至今尚未發現。

1601年利瑪竇歷經波折終於定居北京，在京期間應當時製墨專家程大約之邀為其製版畫三幅，並以拉丁字母給這三篇文章注了音，這三篇文章後“由教會單獨編成一本小冊子，全書一共祇有六頁，取名叫做《西字奇蹟》，收藏在梵蒂岡圖書館，編號是Racc., Gen. Oriente, III, 2331 (12)。”<sup>(58)</sup>

利瑪竇的這三篇拉丁字母注音經尹斌庸整理如下：<sup>(59)</sup>

## 一、信而步海，疑而即沉

sín lth<sup>ˆ</sup> pú hòi nhĩ lth<sup>ˆ</sup> ciě ch<sup>ˆ</sup>in

天主已降生，托人形以行教於世。先誨十二聖徒，  
t<sup>ˆ</sup>iēn chù y<sup>ˆ</sup> kiám sēm t<sup>ˆ</sup>ō gín hīm ì hīm kiáo yū xī siēn hoéi xě lth<sup>ˆ</sup> xím t<sup>ˆ</sup>ū  
其元徒名曰伯多落。伯多落一日在船，恍  
k<sup>ˆ</sup>i iuēn t<sup>ˆ</sup>ū mīm yuě pě tō lǒ pě tō lǒ yě gě Çái ch<sup>ˆ</sup>uēn hoà  
m

惚見天主立海涯，則曰：“倘是天主，使我步海  
hoě kién t<sup>ˆ</sup>iēn chù liě hòi iāi cě yuě t<sup>ˆ</sup>ām xý t<sup>ˆ</sup>iēn chù sǔ ngò pú hòi  
不沉！”天主使之行。時望猛風發波浪，其心便  
pǒ ch<sup>ˆ</sup>in t<sup>ˆ</sup>iēn chù sǔ ch<sup>ˆ</sup>y hīm xī vām moēm fūm fā pō lám k<sup>ˆ</sup>i sīn piēn  
疑而漸沉。天主援其手曰：“少信者何以疑  
nhĩ lth<sup>ˆ</sup> cién ch<sup>ˆ</sup> in t<sup>ˆ</sup>iēn chù iuēn k<sup>ˆ</sup>i xèu yuě xào sín chè hō ì nhĩ  
乎？篤信道之人，踵弱水如堅石。其復疑，水復  
hū tǒ sín táo ch<sup>ˆ</sup>y gín chūm jǒ xui jū kiēn xiě k<sup>ˆ</sup>i fō nhĩ xui fō  
本性焉。勇君子行天命，火莫燃，刃莫刺，水莫  
puèn sīm iēn yūm kiūn çǔ hīm t<sup>ˆ</sup>iēn mīm huò mǒ gēn gín mǒ çǔ xui  
mǒ

溺，風浪何懼乎？然元徒疑也，以我信矣。則一  
niě fūm lám hō kiú hū gēn iuēn t<sup>ˆ</sup>ū nhĩ yè ì ngò sín ì cě  
yě

人瞬之疑，足以竟解兆眾之後疑，使彼無疑  
gín xúm ch<sup>ˆ</sup>y nhĩ çǒ ì kím kiài cháo chūm ch<sup>ˆ</sup>y héu nhĩ sǔ pý vū nhĩ  
我信無據，故感其信，亦感其疑也。”

ngò sín vū nhĩ kiú cú càn k<sup>ˆ</sup>i sín yě càn k<sup>ˆ</sup>i nhĩ yè

歐邏巴利瑪寶撰

ēu ró pà lí mà téu siuén

## 二 徒聞寶，即舍空虛

lth<sup>ˆ</sup> t<sup>ˆ</sup>ū vuēn xiě ciě xè c<sup>ˆ</sup>ūn hiū

天主救世之故，受難時，有二徒避而同行，且  
t<sup>ˆ</sup>iēn chù kiéu xī ch<sup>ˆ</sup>y cú xéu nán xī yèu lth<sup>ˆ</sup> t<sup>ˆ</sup>ū pí lth<sup>ˆ</sup> t<sup>ˆ</sup>ūm hīm c<sup>ˆ</sup>i  
è

談其事而憂焉，天主變形而忽入其中，問憂  
t<sup>ˆ</sup>ān k<sup>ˆ</sup>i sǔ lth<sup>ˆ</sup> yēu iēn t<sup>ˆ</sup>iēn chù piēn hīm lth<sup>ˆ</sup> hǒ giǒ k<sup>ˆ</sup>i chūm vuēn yēu  
之故。因解古《聖經》言，證天主必以苦難救

chy cú ĩn kiài cù xém kīm yēn chím t'ien chù pyē ì c'ù nán kiéu  
 世，而後復入於己天國也，則示我勿從世  
 xí lh̃ héu fō giō yū kŷ t'ien quōē yē cē xý ngò voē ç'ûm xí  
 樂，勿辭世苦歟？天主降世，欲樂則樂，欲苦則  
 lõ voē ç'û xí c'ù iū t'ien chù kiám xí yō lõ cē lõ yō c'ù cē  
 苦，而必擇苦。決不謬矣。世苦之中，蓄有大樂；  
 c'ù lh̃ pyē ciē c'ù kiūē pō miéu ì xí c'ù chy chūm hiō yèu tá lõ  
 世樂之際，藏有大苦。非上智也，孰辨焉？二徒  
 xí lõ chy cý ç'âm yèu tá c'ù fī xám chý yē xō pién iēn lh̃ t'ū  
 既悟，終身為道，尋楚辛如俗人逐珍貝  
 kŷ gū chūm xīn guēy táo sīn ç'ô sīn jū sō gīn chō chyn poéi  
 矣。夫其楚辛久已息，而其受苦之功，常享於  
 ì fū k'í ç'ò sīn kiéu ì siē lh̃ k'í ngái c'ù chy cōm ch'âm hiām yū  
 天國也。

t'ien quōē yē

萬曆三十三年歲次乙巳臘月朔遇寶像  
 vān lyē sān xē sān niēn suí ç'ŭ yē sú lă iuē sō yú pào siām  
 三座耶蘇會利瑪竇謹題  
 sān çóó yē sū hoéi lý mà téu kīn t'ŷ

### 三、淫色穢氣，自速天火

ŷn sē guéi k'í ç'ŭ sō t'ien huò

上右鎖多麻等郡人，全溺於淫色，天主因  
 xám cù sù tō mâ tēm kiún gīn c'iuēn niē yū ŷn sē t'ien chù ĩn  
 而棄絕之。夫中有潔人落氏，天主命天神  
 lh̃ k'í ciuē chy fū chūm yèu kiē gīn lõ xí t'ien chù mīm t'ien xīn  
 預示之，遽出城往山。即天雨，大熾盛火，人及  
 iū xí ch'kiū ch'ŭ ch'īm vām xān ciē t'ien yū tá chiē xīm huò gīn kiē  
 默蟲焚燎無遺，乃及樹木山石，俱化灰燼，  
 xiéu ch'ûm fuēn leáo vū ŷ nài kiē xū mō xān xye kiū hoá hoēi cín  
 沉陷於地，地瀦為湖，代發臭水，至今為證天  
 ch'īn hiēn yū tí tí chiū guēy hū tái fā cheu xuì chí kīn guēy chŷm t'i  
 ēn

帝惡嫌邪色穢淫如此也。落氏機中自致  
 tý ú hiēn siē sē guéi ĩn jū ç'ŭ yē lõ xí guéi chūm ç'ŭ chý  
 淨，是天奇寵之也，善中從善，夫人能之。惟值

cím xý t'ien k'í chùm chy yè xén chūm ɕ'úm xén fū gín nēm chy vuí chiě  
 邪 俗 而 卓 然 竦 正, 是 真 勇 毅, 世 稀 有 焉。智 遇  
 siē sǒ lh̃ chǒ gēn sùm chí m xý chīn yù m nhý xí hī yèu iēn chý iū  
 善 俗 則 喜 用 以 自 賴, 遇 惡 習 則 喜 用 以 自  
 xén sǒ cě hý yúm ì ɕúr lái iū ǒ siē cě hý yúm ì ɕúr  
 勸 無 適 不 由 己 也。  
 lý vū xiě pǒ yēu ký yè  
 萬 曆 三 十 三 年 歲 次 乙 巳 臘 月 朔 遇 寶 像  
 ván lyě sǎn xě sǎn niēn suí ɕ'úr yě súr lǎ iuě sǒ yú pào siá  
 m  
 三 座 耶 穌 會 利 瑪 竇 謹 題  
 sǎn ɕoó yē sū hoéi lý mà téu kìn l'y

#### 四、述 文 贈 幼 博 程 子

xǔ vèn cém yéu pǒ ch'ím ɕúr  
 廣 哉, 文 字 之 功 於 宇 內 耶! 世 無 文, 何 任 其 憤  
 quám ɕāi vèn ɕúr chy cōm yū yù nuí yē xí vū vèn hô gín k'í fuēn  
 悵, 何 堪 其 暗 汶 乎? 百 步 之 遠, 聲 不 相 聞; 而 寓  
 fī hô c'án k'í ngán vén hū pě pú chy yuēn xīm pǒ siām vuēn lh̃ yú  
 書 以 通, 即 兩 人 者 睽 居 幾 萬 里 之 外, 且 相 問  
 xū ì t'ūm ciē leām gín chè q'uēi kiū kì ván lì chy vái c'ie siām vu  
 én  
 答 談 論 如 對 坐 焉。百 世 之 後, 人 未 生, 吾 未 能  
 tǎ t'ān liún jū tuí ɕǒ iēn pě xí chy héu gín Ví sēm gū ví n  
 êm  
 知 其 何 人; 而 以 此 文 也, 令 萬 世 之 後 可 達 已  
 chī k'í hô gī th̃ ì ɕ'úr vèn yē līm ván í chy héu c'ò tǎ ký  
 意, 如 同 世 而 在。百 世 之 前, 先 正 己 沒, 後 人  
 ý jū t'ūm xí lh̃ ɕái pě xi chy c'tēn siēn chým ý mǔ héu gín  
 因 其 遺 書, 猶 聞 其 法 言, 視 其 豐 容, 知 其 時 之  
 yn k'í ý xǔ yēu vuē k'í fǎ yēn xý k'í fūm yūm chī k'í xý chy  
 治 亂, 於 生 彼 時 者 無 異 也。  
 Chý luón yū sēm pì xì chè vū ý yē  
 萬 國 九 州, 棼 布 大 地。一 人 之 身, 百 旬 之 壽,  
 ván quoě kiēu chēu fuēn pú tá tí yě gín chy xīn pě siūn chy xéu  
 竭 蹶 以 行, 不 能 殫 極。而 吾 曹 因 書 志, 卧 坐 不  
 kiē kiūě ì hīm pǒ nēm tǎn kiē lh̃ gū ɕ'áo yn xū chý guó ɕǒ pǒ  
 出 室 門, 即 知 其 俗, 達 其 政, 度 其 廣, 識 其 土

ch'ũ xě mên ciě chī k'í sǒ tǎ k'í chí m tǒ k'í quàm xiě k'í t'ù  
 宜物產,曾不終日,與地如指掌焉。聖教之業,  
 nhĩ voẽ ɕ'ân cēm pǒ chũm gě yũ tí jũ chì chàm iên xím kiáo chy nhĩ  
 百家之工,六藝之巧,無書何令今至盛若是  
 pě kiā chy cūm lǒ nhĩ chy k'iao vũ xũ hô lĩm kĩn chí xím jǒ xí  
 歟?故國愈尚文,愈易治,何者?言之傳莫紀之  
 iù cú quǒẽ iũ xám vên iũ yí chý hô chè yên chy ch'uên mǎ kí chy  
 以書,不廣也,不穩也。一人言之,或萬人聽之,  
 ì xũ pǒ quàm yè pǒ uèn yè yě gĩn yên chy hoẽ ván gĩn t'ím chy  
 多則聲不暨。已書者能令無量數人同聞  
 tō cě xím pǒ ký ý xũ chè nēm lĩm vũ leām sú gĩn t'ũm vuên  
 之,其遠也且異方無礙也。言者速流,不容聞  
 chy k'í yuèn yè c'ie ý fām vũ ngái yè yên chè sǒ liêu pǒ yũm vuên  
 者詳思而諦識之,不容言者再三修整而  
 chè c'ian sũ lh̃ tỳ xiě chy pǒ yũm yên chè ɕáy sǎn siêu chĩm lh̃  
 俾確定焉。若書也,作者預擇之筆,而重筆改  
 pì k'io tĩm iên jǒ xũ yè ɕó chè yũ cě chũ piẽ lh̃ ch'ũm piẽ cài  
 易,方圓及著之眾也。故能著書,功大乎立言  
 ỹ fām yuèn nài chú chy chũm yè cú nēm chú xũ cōm tá hũ liẽ yên  
 者也。

chè yè

今歲竇因石林祝翁詩柬,幸得與幼博程  
 kĩn suí téu ĩn xě tĩn chũ vũm xĩ kièn hĩm tẽ iù yéu pǒ  
 ch'ĩm

子握手,知此君旨遠矣。程子壽逾艾而志氣  
 ɕũ ǒ xě chĩ ɕ'ũ kiũm chì yuèn ì ch'ĩm ɕũ xéu yũ gái lh̃ chí  
 k'í

不少衰,行遊四方,一意以好古博雅為事。即  
 pǒ xào xuĩ hĩm iêu sú fām yě ý ì háo cù pǒ yà guèi sú ciě  
 其所製墨絕精巧,則不但自作,而且以廓  
 k'í sǒ chí mǎ ciuẽ cĩm k'iao cě pǒ tǎn ɕũ ɕó lh̃ c'ie ì q'ũ  
 助作者。吾是以欽仰大國之文至盛也。  
 ɕú ɕó chè gũ xý ì k'ĩn nhàm tá quǒẽ chy vên chý xím yè  
 向常見中國彝鼎法物,如博古圖所載,往  
 hiám xām kièn chũm quǒẽ ý tĩm fǎ voẽ jũ pǒ cù t'ũ sǒ ɕáy vàm  
 往極工致。其時人無異學,工不二事,所以乃  
 vàm kiẽ cūm chý k'í xĩ gĩn vũ ý hiǒ cūm pǒ lh̃ sú sǒ ì nài

爾。今 觀 程 子 所 制 墨，如 墨 苑 所 載，似 與 疇 昔  
 lh' k' in quōn ch' im ɕŭ sò chí mǎ jū mǎ iuèn sò ɕà y sŭ yìu ch' eu si  
 ě  
 工 巧 無 異。吾 乃 諗 大 國 之 文 治，行 將 上 企 唐  
 cūm k' iào vū ý gū nài xìn tá quōě chy vèn chý hím ciām xám k' í  
 t' âm  
 虞 三 代，且 駸 駸 上 之 矣！  
 Yū sām táy c' iè c' in c' in xám chy i  
 程 子 聞 敝 邦 素 習 文，而 異 庠 之 士 且 文 者  
 ch' im ɕŭ vuèn pí pām sú siě vèn lh' ý siām chy sŭ c' iè vèn chè  
 殊 狀，欲 得 而 諦 觀 之。予 曰：“子 得 中 國 一 世  
 xū ciām yǒ tǎ lh' tŷ quōn chy yù yuě ɕŭ tǎ chūm quōě yě xí  
 之 名 文，何 以 荒 外 文 為 耶？徧 小 之 國，僻 陋 之  
 chy mím vèn hô ì hoām vái vèn guēi yē pièn siào chy quōě p' iě léu chy  
 學，如 令 演 繹 所 聞，或 者 萬 分 之 一，不 無 少 裨  
 hoǒ jū līm yèn yě sò vuèn hoě chè ván fuēn chy yě pǒ vū xào pŷ  
 大 國 文 明，之 盛 耳。若 其 文 也，不 能 及 也！”  
 tá quōě vèn mím chy xím lh' jǒ k' i vèn yē pǒ nēm kiě yē  
 萬 萬 三 十 三 年 歲 次 乙 巳 臘 月 朔 歐 邏 巴  
 ván lyě sām xě sām niēn suí ɕ' ŭ yě sŭ lǎ iuě sǒ ēu ró pà  
 利 瑪 竇 撰 並 羽 筆  
 lí mà téu siuén pím yù piě

比利時傳教士金尼閣在利瑪竇逝世後與中國文人王徵合作，於1626年完成了《西儒耳目資》一書。這部書是對利瑪竇方案的一個具體運用，它“祇是對利瑪竇等人的方案做了一些非原則性的修改，其中主要是簡化了拼法，可以說是對這個方案的進一步完善。”<sup>(60)</sup>

從《葡漢辭典》到《西儒耳目資》，入華耶穌會士完成了用拉丁字母拼讀方案的制定。“《西儒耳目資》是一部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著作……”<sup>(61)</sup>羅常培先生把從利瑪竇到金尼閣的努力稱為“利－金方案”，並認為這一方案對中國音韻學有三大貢獻：

第一、“借用羅馬字母作為拼音的符號，使後人對於音韻學的研究，可以執簡馭繁”；

第二、可以依據“利－金方案”所提供的材料來確定明末“官話”的音值；

第三、“自從利瑪竇金尼閣用羅馬字標注漢音，方以智、楊選杞、劉獻廷受到了他們的啟示，遂給中國音韻學的研究，開闢出一條新路徑。”<sup>(62)</sup>

金尼閣的《西儒耳目資》的拼音方案為今日的中文拼音打下了基礎，以下兩個表<sup>(63)</sup>可看出二者之間的關係。從這兩個表的相似性可以看出今天我們所採用的拼音方案是受到了金尼閣和王徵《西儒耳目資》拼音方案的影響。

表一

|           | 韻母  | 聲母  | 名稱字母 | 聲調 | 中文音節   |
|-----------|-----|-----|------|----|--------|
| 《西儒耳目資》方案 | 50個 | 20個 | 29個  | 5個 | 1,507個 |
| 現有方案      | 35個 | 21個 | 26個  | 4個 | 1,331個 |

表二

|           | 一字韻母 | 二字韻母 | 三字韻母 | 四字韻母 |
|-----------|------|------|------|------|
| 《西儒耳目資》方案 | 5個   | 20個  | 22個  | 1個   |
| 現有方案      | 6個   | 21個  | 12個  | 4個   |

### 豐富了中國近代漢語辭彙

學習中文，編寫辭典，而後翻譯西方書籍，介紹西方文化。這幾乎是明末清初以來所有入華傳教士所要經歷的兩個階段。將西方的語言學著作譯介到中國，這是他們學習中文達到一定程度的一個標誌，另一方面這種翻譯過程又對中國語言產生了影響，這種影響的重要方面之一就是豐富了漢語的辭彙。

首先，傳教士的中文著作豐富了中文宗教辭彙。最早傳入中國的基督教流派是唐貞觀年間的景教，現流傳下來的漢文景教文獻有九種。<sup>(64)</sup> 景教在譯經過程中就創造了一些辭彙，如，〈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頌並序〉中將“撒旦”譯為“娑殫”，將“彌賽亞”譯為“彌施訶”<sup>(65)</sup>；在《序聽迷詩所經》中將“天主”譯為“天尊”，將“耶和華法”譯為“天尊序婆之法”<sup>(66)</sup>。

明末清初基督教第二次入華以後在譯經過程中也創造了一些新的宗教辭彙。羅明堅最早在肇慶寫《祖傳天主十誡》，“天主”一詞屬借用詞，《史記》封禪書中，“天主”祇是八神之一的名稱，以後佛教在經書中也稱諸天之主為天主。但經羅明堅之後，利瑪竇寫出《天主實義》等一系列書後，“天主”一詞被賦予了新的含義，成了基督教中“上帝”、拉丁文 Deus 的漢文表達。類似的這種借用詞還有“禮拜”等。同時，他們也創造出了一些新詞：

性簿錄 Simbolo（信經）  
厄格勒西亞 Ecclesia（教會）  
罷德肋 Padre（聖父）  
共斐兒瑪藏 Confirmação（堅振）  
費略 Figlio（聖子）  
共蒙仰 Comunhão（領聖體）  
撥弟斯摩 Baptismo（聖洗）  
撒格辣孟多 Sacramento（聖事）

新教傳教士入華以後也十分關注《聖經》中文版的翻譯，馬禮遜用了很大的力氣去翻譯《聖經》，與此同時還有馬士曼的《聖經》譯本。馬禮遜在翻譯時有些辭彙採取了借用中文詞的方法，如 God，他譯為“神”；有些則根據中國的習慣加以創造，如 Baptism 他譯為“洗禮”。馬禮遜譯本的主要概念如下：

God（神）  
Baptism（洗禮）  
Jehovah（神主）  
Holy spirit（聖風）

根據李志剛的研究，當時幾個主要譯本對《聖經》各章譯名略有差異，但這些章名卻對以後的基督教術語產生了重要影響，現將各種《聖經》譯本的章名列表如下：

新約聖經各版本目錄表

| 英皇欽定本<br>King James Version<br>The New Testaments<br>(章) | 馬禮遜譯本<br>神天上帝啟示<br>新遺紹書<br>(章) | 委辦譯本<br>(章)    | 淺文理釋本<br>新約聖經目錄<br>(章) | 和合譯本<br>(章) |
|----------------------------------------------------------|--------------------------------|----------------|------------------------|-------------|
| 1.St.Matthew (28)                                        | 馬寶書 (28)                       | 馬太福音傳 (28)     | 馬太福音 (28)              | 馬太福音 (28)   |
| 2.St.Mark (16)                                           | 馬耳可書 (16)                      | 馬可福音傳 (16)     | 瑪可福音 (16)              | 馬可福音 (16)   |
| 3.St.Luke (24)                                           | 路加書 (24)                       | 路加福音傳 (24)     | 路加福音 (24)              | 路加福音 (16)   |
| 4.St.John (21)                                           | 若翰書 (21)                       | 約翰福音傳 (21)     | 約翰福音 (21)              | 約翰福音 (21)   |
| 5.Theacts (28)                                           | 使徒行傳 (28)                      | 使徒行傳 (28)      | 使徒行傳 (28)              | 使徒行傳 (28)   |
| 6.Epistle to Romans (16)                                 | 與羅馬輩書 (16)                     | 使徒保羅達羅馬人書 (16) | 達羅馬人書 (16)             | 羅馬人書 (16)   |
| 7.I Corinthians (16)                                     | 可林多輩多一書 (16)                   |                |                        |             |
| 8.II Corinthians (13)                                    |                                |                |                        |             |

其次，傳教士的中文譯本大大豐富了中文的科技辭彙。例如在《幾何原本》中利瑪竇和徐光啟創造了關於幾何的一系列新詞：幾何、點、線、直線、平面、曲線、三邊形、四邊形、多邊形、平行線、對角線、相似、直角、垂線、鈍角<sup>(67)</sup>，這些辭彙沿用至今。

利瑪竇在《萬國輿圖》中，艾儒略在《職方外記》中，創造了“經線”、“緯線”、“熱帶”、“冷帶”、“溫帶”、“地球”、“地中海”、“亞細亞”、“歐邏巴”等一系列新的地理方面的辭彙，有些則是將中文原有的辭彙賦予新義，如“北極”、“南極”、“赤道”等。<sup>(68)</sup>

另外，鄧玉涵對物理學辭彙有所創新，巴多明對生物學辭彙有所創新等等，我們不再一一列舉。關於這方面的研究仍大有空間，有許多基礎性研究需要去做。

新教入華以後，由於其譯書的數量、規模都要超過明清間入華的耶穌會時期，因而在科技辭彙的創新上更為突出。偉烈亞力（Alexander Wylie, 1815-1887）和中國學者李善蘭在《代數學》和《拾級》中第一次提出了解析幾何，微積分的新術語。如他們所創的解析幾何學的新詞有：

|      |    |    |
|------|----|----|
| 代數幾何 | 原點 | 軸線 |
| 縱橫線  | 橫線 | 縱線 |

|        |        |        |
|--------|--------|--------|
| 縱橫軸    | 橫軸     | 縱軸     |
| 極      | 原線     | 帶徑     |
| 極角距    | 直角縱橫軸  | 相距線    |
| 圓錐曲線   | 物線     | 物線之心   |
| 準線     | 通徑     | 物線之徑   |
| 次切線    | 法線     | 次法線    |
| 橢圓     | 橢圓之二心  | 橢圓之中心  |
| 橢圓之徑   | 長徑（軸）  | 短徑（軸）  |
| 長軸之通徑  | 橢率     | 正、餘通弦  |
| 相屬徑    | 雙曲線    | 雙曲線之心  |
| 雙曲線之中點 | 雙線徑    | 雙曲線之橫徑 |
| 橫徑之通徑  | 等邊雙線   | 雙線兩心差率 |
| 相屬雙線   | 漸近線    | 立方拋物線  |
| 三乘方拋物線 | 半立方拋物線 | 三乘方拋物線 |
| 代數曲線   | 越曲線    | 擺線     |
| 擺線之母輪  | 擺線之母點  | 對數曲線   |
| 螺線     | 亞奇米德螺線 | 雙曲螺線   |
| 對數螺線   |        |        |

另外，偉烈亞力在《拾級》序言中提到如下曲線名稱：薛荔葉線、蚌線、餘擺線、和音線、次擺線、弦切諸線、指數線、等角螺線、交互螺線、兩端懸線、葛西尼諸橢圓線、平行動線等。

微積分學術語有：

變數 常數 函數 陽函數 陰函數  
 增函數 損函數 限 微分 微係數  
 微長數 長數 級數 疊微分 偏微分  
 全微分 偏微分 極大 極小 極大點  
 極小點 代數函數 越函數 對函數 指函數  
 圓函數 線微分式 曲率 曲率半徑  
 合吻(曲率)圓  
 漸伸線 獨異點 凸 凹 彎點  
 倍點 歧點 特點 積分<sup>(69)</sup>

dividend 實  
 ratio 率  
 common measure 等數  
 proportion 比例，粟布  
 evoluton 開方，少廣  
 solid mensuration 商功<sup>(67)</sup>

由於西方書籍的大量翻譯，譯名的統一就成了一個大問題，比較而言新教傳教士更為主動和自覺地注意到了這個問題。傅蘭雅（John Fryer 1839-1928）當時提出了名詞翻譯和定名的三項原則：

“1）沿用中文已有名詞。例如，金、銀、銅、鐵、硫磺等。若譯名中文已有，但中文辭典內查不到，例如強水（硝酸），磺水（硫酸）等，則可參考已有之中文同類譯書，或詢問知其名詞的中國技術人員、商賈或工人。2）設立新名：i. 常用漢字加偏旁，仍借用其音。例如，鎂、鉀、鉍、碳等。ii. 以幾個漢字表示一個譯名，並常按物性意譯。例如養氣（氧）、輕氣（氫），火輪船等。iii. 直接音譯為漢字，有機化學初始大多依此，如金雞納（奎寧）等。3）編纂外漢專科辭典。凡譯書時所定新名（人名、地名、物名）皆隨時收集，出版時附於書末，以便查閱。待收集足時，可彙成外漢專科辭典，以使後繼譯書者查考。”<sup>(70)</sup>

他們的確也是按照這個原則來做的，如在譯數學著作時，中國有豐富的數學文獻和數學術語，他們在確定譯名時盡量採用，將相同或相近意義的術語對應起來，例如

plane mensuration 方田  
 fellowship 衰分  
 alligation 均輸  
 indeterminate analysis 盈月  
 trigonometry 三角法，勾股  
 altitude of a right-angled triangle 股

正是在傅蘭雅，偉烈亞力等人的努力下，1891年益智書會成立了以傅蘭雅為主席的地名人名委員會，雖然這項工作後來進展不大，但他們的設想和譯名原則還是有積極意義的。以後江南製造局編製了一些專業性詞典，大多也都有新教傳教士的參加，如〈汽機中西名目表〉、〈化學材料中西名目表〉、〈西藥大成藥品中西名目表〉、〈金石識別表〉等，這些對統一當時的科技術語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三，入華傳教士所創立的社會科學及社會生活方面的新詞。

明清之際入華耶穌會士在創立社會科學的漢語辭彙時，大多是音譯而不是意譯，如艾儒略在《西學凡》中這樣翻譯：

落日加 logica （邏輯）  
 默達費西加 metaphysica （形而上學）  
 費斐錄所費亞 （理學）  
 philosophia （哲學）

這些辭彙大多沒有流傳下來，但他們仍為中國的社會科學的發展留下了一些重要概念，奠定了基礎，如傅汎際（François Furtado, 1587 (1653)）和李之藻合譯的《名理探》，為中國邏輯學的發展提供了一系列重要的範疇，下面這個表便可看出這一點：

| 《名理探》譯名                | 今日邏輯概念                     |
|------------------------|----------------------------|
| 宗<br>類<br>殊<br>獨<br>依性 | 類<br>種<br>種差<br>固有非質屬性、偶有性 |

這是對亞里士多德“謂詞理論”的翻譯，晚清時嚴複翻譯《穆勒名學》時，就受到了《名理探》的影響，如把“五公論”改為“五旌”，而概念論則直接用了《名理探》的“十論”譯法。<sup>(72)</sup>

新教傳教士入華及在中國周邊活動時也創造了不少新的有關社會生活和社會科學的新辭彙，如：

|      |                                    |
|------|------------------------------------|
| 貿易   | (trade)                            |
| 火車   | (train)                            |
| 文學   | (literature)                       |
| 公司   | (Company)                          |
| 法律   | (law)                              |
| 新聞   | (new)                              |
| 火輪車  | (wheelsteamship)                   |
| 巴釐滿  | (parliament)                       |
| 火輪車  | (steam-train)                      |
| 目文好司 | (house of commons) <sup>(73)</sup> |

馬禮遜在他的《華英字典》中也首次使用了一些新的現代漢語語詞，例如：

|                       |         |
|-----------------------|---------|
| apostle               | 使徒      |
| apostle of Jesus      | 耶穌的使徒   |
| (《英漢字典》頁27)           |         |
| blacklead             | 鉛       |
| blacklead pencil      | 鉛筆      |
| (《英漢字典》頁44)           |         |
| critic of books       | 善批評書士   |
| (《英漢字典》頁98)           |         |
| digest in the stomach | 胃中消化    |
| (《英漢字典》頁120)          |         |
| exchange              | 換、交換    |
| (《英漢字典》頁153)          |         |
| infect                | 病過與人，傳染 |
| (《英漢字典》頁228)          |         |
| jude                  | 審、審判    |
| (《英漢字典》頁238)          |         |

|                              |            |
|------------------------------|------------|
| law                          | 法、法律、法度    |
| (《英漢字典》頁249)                 |            |
| level                        | 平的、水平、水準   |
| (《英漢字典》頁254)                 |            |
| natural                      | 自然的        |
| (《英漢字典》頁290)                 |            |
| necessarily                  | 必要地        |
| (《英漢字典》頁291)                 |            |
| organ                        | 風琴         |
| (《英漢字典》頁309)                 |            |
| practice                     | 習、習行、演習、習射 |
| (《英漢字典》頁331)                 |            |
| unit                         | 單位         |
| (《英漢字典》頁449) <sup>(74)</sup> |            |

漢語中的外來詞是漢語詞彙學研究中的一個重要方面，魏晉南北朝佛教傳入後，“大量佛經譯成漢語，對漢語尤其是漢語辭彙產生了巨大影響。”<sup>(75)</sup>漢語辭彙史上外來詞最多的另一個時期就是明清時期，從利瑪竇到傅蘭雅，從羅明堅到馬禮遜，傳教士大量的中文著作為近代漢語辭彙提供了大量的外來詞。這些辭彙中有完全音譯的如阿門(amen)；有的是音譯兼意譯的，即兼顧了語音和語義兩個方面，如引擎(engine)；也有半音譯半義譯的，即這些詞一部分是音譯，一部分是義譯，如白令海(Behring Sea)，“白令”為音譯，“海”為意譯；有些是舊詞新用如“天主”(Deus)，神(God)。<sup>(76)</sup>王力先生認為“鴉片”就是一個借用詞，《本草綱目》穀部“阿芙蓉”下說“阿芙蓉，一名阿片，給作鴉片，是罌粟花之津液也。”所以他說鴉片“這個詞是從英語 Opium 借來的。”<sup>(77)</sup>

傳教士所創立的這些外來詞，不僅豐富了漢語的辭彙，也使“漢語複音化的發展速度更快了”<sup>(78)</sup>，即從單音節詞向多音節詞的發展速度加快了，更多的多音節詞出現了。意大利漢學家馬西尼(Federico Masini)也認為，“來自西方語言的那些借詞，是促使漢語向多音節化方向發展的一個主要因素。”<sup>(79)</sup>

傳教士所引入中文中的這些外來詞不僅僅在語

言學內部產生了影響，它還代表了西方文化在中國的影響，任何“外來詞具有語言、文化、社會三種符號身份”<sup>(80)</sup>，因此，“外來詞無疑也是語言文化的一種體現”。<sup>(81)</sup>如利瑪竇、馬禮遜等人所創立的一些基督教辭彙無疑代表了西方宗教文化，表現了西方文化同中國文化的融合。正如邢福義所說：

“詞語借用是一種廣泛的語言文化現象。從表層來看，詞語借用在文化交流中起到了傳遞文化資訊的作用；而深一層來看，各個時代，各個不同社會之間文化交流的各種各樣的媒介和方式及形形色色的內容都會在詞語借用中留下生動的記錄。”<sup>(82)</sup>也就是說，漢語外來詞是文化交流的體現，是一個民族文化變遷的見證。晚明至晚清近三百年間傳教士們在他們的中文著作中對漢語辭彙發展的貢獻，至今尚無一部專門性的研究著作。明末清初天主教入華留下近七百多部著作，馬禮遜入華後基督教新教又留下近千部著作，由於這些中文著作大陸學者許多還讀不到，因而無法深入研究。從漢語詞彙學來說這是一個亟待開發和研究的重要領域。<sup>(83)</sup>

## 【註】

- (1) 近年來姚小平先生對此做了開創性的研究，參閱姚小平：〈西方人眼中的中國語言學史〉，載《中國語言學報》1996年第3期；〈《漢方經緯》與《馬氏文通》歷史功績重議〉，載入《當代語言學》第1卷，1992年第2期。
- (2) 吳孟雪：《明清時期歐洲人眼中的中國》，頁6，中華書局，2000年。
- (3)(4)(5) 楊福綿：〈羅明堅、利瑪竇《葡漢辭典》所記錄的明代官話〉，《中國語言學報》，第五期，頁35-81，頁39。張西平：〈羅明堅——西方漢學的奠基人〉，《歷史研究》第3期，2001年。
- (6) 楊福綿：〈羅明堅、利瑪竇《葡漢辭典》所記錄的明代官話〉，《中國語言學報》第5期。
- (7) 王力達：《漢語研究小史》，頁12，商務印書館，1963年。
- (8) Knud Lundbaek, T.S.Bayer (1694-1738) Pioneer Sinologist, Curzon Press 1986.
- (9) (法)戴仁主編，耿昇譯：《法國當代中國學》，頁23，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實際上德經這部辭典是在巴西勒(Basil de Glemona) 1694-1699年所編的漢一拉詞典基礎上，將其譯為法文而成，德經將巴西勒名字略去，祇署了自己的名，以後此事最終被雷慕沙揭露了出來。
- (10) 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頁100、165、209，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 (11) 閻純德：《漢學研究》，第5集，頁2-37，中華書局，2000年。
- (12) 吳義雄：《在宗教與世俗之間：基督教新教傳教士在華南沿海的早期活動研究》，頁500-502，廣東教育出版社，2000年。
- (13) 同注5。
- (14) Robert Morrison, 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ree parts, 《字典》Vol.1, 序言，頁9。這裡的引文轉引自譚樹林的博士論文《馬禮遜與中西文化交流》的抽樣本，頁35。在此對黃時鑒先生贈送我譚樹林的論文抽樣本表示感謝。
- (15) 譚樹林：《馬禮遜與中西文化交流》，抽樣本，頁36。
- (16) Marshall Broomhall, Robert Morrison, A Master Builder, p. 153, 轉引自譚樹林文，頁45。
- (17) 吳義雄：《在宗教與世俗之間：基督教新教傳教士在華南沿海的早期活動研究》，頁499，廣東教育出版社，2000年。
- (18) 考狄認為“1703年在廣州出版《官話藝術》已不是瓦羅的最初的編寫本，他最初的版本祇能在傳聖澤的書中看到。”見許光華：〈16至18世紀傳教士與漢語研究〉，見任繼愈主編：《國際漢學》第六期，第476頁，大象出版社，2000年。
- (19) (法)貝羅貝：《20世紀以前歐洲漢語語法學研究狀況》，見侯精一，施蘭淦主編：《馬氏文通與漢語語法學》。
- (20) W. South Coblin & Joseph A. Levi, Francisco Varo's Grammar of The Mandarin Language (1703), An English Translation of 'Arte de La Lengua Mandarin', John Benjamins B.V. 2000.
- (21) 許明龍主編：《中西文化交流先驅》頁277-280，東方出版社，1993年。近年來許明龍先生對此問題有深入的研究。
- (22) 馬若瑟：《中國語言志略》，序言頁1-35，1847年英文版。
- (23) 馬若瑟：《中國語言志略》，頁1-167，1847年英文版。
- (24) 馬若瑟：《中國語言志略》，頁168-323，1847年英文版。
- (25) 更為深入的研究見後面李真的〈馬若龍《漢語札記》研究〉，張西平等編著《西方人早期漢語學習史調查》，大百科出版社2003年，頁131-165。
- (26) (法)戴密微：《法國漢學史》，(法)戴仁主編，耿昇譯：《法國當代中國學》，頁16、15，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
- (27) 方豪：《中西交通史》，頁963，岳麓書社，1997年。
- (28) 何九盈：《中國現代語言學史》，頁130-173，廣東教育出版社，2000年。
- (29) 黎錦熙：《新著國語文法》，今序(1951)頁19，商務印書館，1998年。
- (30) 張拱貴、廖序東：〈重印新著國語文法序〉，見《新著國語文法》，頁5，商務印書館，1998年。
- (31) (法)馬伯樂：〈漢學〉，見閻純德主編：《漢學研究》第三集，頁48，中國和平出版社，1999年。
- (32) Knud Lundbaek, T.S.Bayer (1694-1738) Pioneer Sinologist, Curzon Press, 1986.
- (33)(34) 何莫邪：(Christoph Harbsmeier)：〈《馬氏文通》以前的西方漢語語法書概況〉，見《文化的饋贈：漢學研究國際會議論文集·語言學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

- (35) (法)戴密微：〈法國漢學史〉，見戴仁主編，耿昇譯：《法國當代中國學》，頁27。
- (36) (法)艾樂桐：〈歐洲忘記了漢語卻發現了漢字〉，貝龍巴爾，李學勤主編：《法國漢學》第一本，見頁184，清華大學出版社，1996年。
- (37) 吳義雄：《在宗教和世俗之間：基督教新教傳教士在華南沿海的早期活動研究》，頁480。
- (38) 吳義雄：《在宗教和世俗之間：基督教新教傳教士在華南沿海的早期活動研究》，頁488。詹姆斯·裨治文也就是布里奇曼。
- (39) 說馬建忠是“第一次為漢語草創了一個完整的語法體系”顯然不妥，在此之前的傳教士語法書已出版很多。姚小平的意見較為中肯，應在對馬建忠地位的評價前加上一個“在中國學術圈內”或者“在中國語言學的歷史上”這樣一個限定語更好些，見《當代語言學》第1卷，1999第2期，頁1-16。
- (40) (法)貝羅貝：〈二十世紀以前歐洲語法學研究狀況〉，見侯精一，施蘭淦主編：《〈馬氏文通〉與漢語語法學》，頁157-158。Saint Ignace，即“徐家匯教會學報”。
- (41) Peverelli, p.1986,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Grammar Studies*. Leiden University. PhD.
- (42) 姚小平：〈《漢文經緯》與《馬氏文通》——《馬氏文通》歷史功績重議〉，載《當代語言學》第1卷，1999年第2期，頁16。
- (43) 這個書單僅僅是很小的一部分，參閱何莫邪：〈《馬氏文通》以前的西方漢語語法書概況〉，載《文化的饋贈：漢語研究國際會議論文集·語言學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
- (44) 詳見後面于蔭的艾約瑟《漢語官話口語語法》，關於這本書的出版時間尚須進一步研究，也有“1868年”一說。
- (45) 此書已被張衛東先生譯為中文，《語言自邇集：19世紀中期的北京官話》，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在此對衛東先生的贈書表示感謝。
- (46) 全(43)上揭書。
- (47)(48)(49) 姚小平：〈《漢文經緯》與《馬氏文通》——《馬氏文通》歷史功績重議〉，載《當代語言學》第1卷，1999年2月。
- (50) 莫東寅：《漢學發達史》，頁111，上海書店，1989年影印本。
- (51) 轉引自姚小平：〈《漢文經緯》與《馬氏文通》——《馬氏文通》歷史功績重議〉。
- (52) 何莫邪：〈《馬氏文通》以前的西方漢語語法書概況〉，載《文化的饋贈：漢語研究國際會議論文集·語言學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
- (53) 何九盈：《中國古代語言學史》，頁140，廣州教育出版社，2000年6月。
- (54) 楊福綿：〈羅明堅、利瑪竇《葡漢辭典》所記錄的明代官話〉，載《中國語言學報》第5期，頁38，1995年6月出版。
- (55) 任繼愈主編：《中國國家圖書館古籍珍品圖錄》，頁216，北京圖書館，1999年。
- (56) 該拉丁文是美國 Georgetown 大學歷史系魏若望 (John W. Witek, S.J.) 教授幫助我整理的，在此表示感謝。這裡我們尚未公布拉丁全文和中文全文，因這分文獻是由這三部分組成的，參閱張西平：《中國與歐洲早期宗教和哲學交流史》，東方出版社，2001年，頁152-157。另，這裡的文獻未標出每個字的音調符號，在適當的時候筆者將補上音調符號。
- (57) 何高濟等譯：《利瑪竇中國割記》頁336，中華書局，1993年。
- (58) 尹斌庸：〈利瑪竇等創制漢語拼寫方案考證〉，載王元化主編：《學術集林》卷1，頁349，上海遠東出版社，1995年。參閱尹斌庸：〈《西字奇蹟》考〉，《中國語文天地》，1986年第2期。
- (59) 在此衷心感謝尹斌庸先生提供這三篇拉丁字母注音的整理稿。並同意我在這裡使用他所做的標音。
- (60) 尹斌庸：《利瑪竇等創制漢語拼寫方案考證》，載王元化主編：《學術集林》卷4，頁350。
- (61) 何九盈：《中國古代語言學史》，頁251。
- (62) 羅常培：〈耶穌會士在音韻學上的貢獻〉，《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930年第一本，第三分冊，頁267-388。
- (63) 以上兩表摘自黎難秋：《中國科技文獻翻譯史稿》，頁246，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1993年。
- (64) 朱謙之：《中國景教》，頁115，117，東方出版社，1993年。
- (65) 趙維本牧師著：《譯經溯源：現代五大中文聖經翻譯史》，頁9，香港中國神學研究院，1993年。
- (66) 同註64。
- (67) 曹增友：《傳教士與中國科學》，頁115，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年。
- (68) 艾儒略著，謝方校釋：《職方外紀校釋》，中華書局，1996年。
- (69) 汪曉勤著：《中西科學交流的功臣：偉烈亞力》，頁77-78頁，科學出版社，2000年。
- (70) 黎難秋：《中國科學文獻翻譯史稿》，頁237，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出版社，1993年。
- (71) 汪曉勤：《中西科學交流的功臣：偉烈亞力》，頁81。
- (72) 樓宇烈，張西平主編：《中外哲學交流史》，頁183，184，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
- (73) (意)馬西尼著，黃河清譯：《現代漢語辭彙的形成：19世紀漢語外來詞研究》，頁28，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7年。
- (74) 譚樹林：《馬禮遜與中西文化交流》，頁47，抽樣本。劉禾《跨語界實踐》頁346-460提供了一個十分詳細的詞表，這是目前中文文獻中，對此問題最系統的研究。
- (75) 向熹：《簡明漢語史》(上)，頁543，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
- (76) 向熹：《簡明漢語史》，頁687、691，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
- (77) 王力：《漢語史稿》，下冊，頁523頁，中冊，頁343頁，中華書局，1980年。
- (78)(79) (意)馬西尼著，黃河清譯：《現代漢語辭彙的形成：十九世紀漢語外來詞研究》，頁145。
- (80) 史有為：《漢語外來詞》，頁98、99，商務印書館，2000年。
- (81) 同註78。
- (82) 邢福義：《文化語言學》，頁225，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 (83) 馬西尼的《現代漢語辭彙的形成：十九世紀漢語外來詞研究》無疑是近年來這一領域最重要的研究著作，但該書側重於19世紀漢語外來詞的研究，對16-18世紀的研究尚顯不足。